

在岁月中慢慢消磨被俘伤痕

命运从此改变

如果不回忆往事,吴春生和大约4岁的志愿军老战友张城垣都有一个安静和乐的晚年。

吴老曾是黄埔军校24期学员,起义后加入解放军60军,张城垣是他同一个军的宣教干部,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他们所在的志愿军60军180师陷入重重包围,饥寒交迫丧失战斗力后,两人先后被俘,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

退休以后,吴春生理首著述战俘营回忆录。张城垣准备出一本50万字的文集。两年多战俘营的经历早已远去,但带给他们的却是一生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2.1万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其中7000多人选择回国,包括吴春生和张城垣。

实际上,中国1952年就宣布承认《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在1953年争取朝中战俘归来的《告被俘人员书》中说:“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

吴春生早就决定回国,他说:“我对‘新民主主义’充满向往,梦想着回家继续大学学业。”关在同一个战俘营内的张城垣想着自己无愧于祖国,回来肯定受表扬。然而战俘交换后,“归来人员管理处”下发的文件让大家惊醒:“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配合审查时,为他们放映的影片都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

一张发黄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收藏在吴春生床头的抽屉里,上面写着当时从军处理的审查结果:“承认被俘前军籍,取消候补团员资格。”张城垣没想到自己的结论竟然是:“恢复军籍,党籍悬

案。受敌严刑拷打过多,是否有失节行为,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

安稳日子没有了

被俘的遭遇带给归来者无尽痛苦,“180师是个悲剧,被俘人员也是悲剧。”头发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的张城垣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

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被俘”两个字一度成为他们无法揭去的耻辱标签。吴春生回乡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向党交心”运动中,“聪明的都说好话”,真诚的吴春生却透露了自己对被俘处理结果不满。“吴老师还被俘过?!”他一下成了学校“交心”典型。

这位“年轻有为”的美术老师在无休止地审查、诱供后,终于丢了工作,“连劳改犯都不如。”他甚至想过自杀。

家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他只好闯关东,到东北乡间走村串户,靠给人画像谋生。腊月初九晚上,北上的列车经过清冷的沈阳站时,吴春生突然想起当年志愿军60军大部队,就是热热闹闹地从这里转车入朝参战,一时感慨万千。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俘归国人员总是难逃冲击。由于档案里的被俘记录,张城垣先后被乡信用社、县广播站辞退,他回村当了一名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爆发,安稳日子也没有了。

星散各地的战友写来的求助信让他心如刀割,最多时一个月收到1000多封,难友们问这位“领导人”:“当时说回来还能入党,现在怎么都成狗熊了?!”

他连自身也难保了,“造反派”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只得当羊倌接受改造。张城垣虚心向老羊倌请教,43只羊3年繁殖了130多只。但他仍是“专政对象”,妻子招工受阻,女儿考上高中不许上气得休克过去。

“文革”是志愿军被俘归来人

员的劫难。战友们遭迫害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被“造反派”打死,有的忍受不了一次次批斗,绝望自杀。美军集中营里与张城垣睡一个帐篷的难友孟晓峰被打成“叛徒”,妻子离婚,他从河南老家挑着儿子和行李来到垣曲,挨个村子寻找张城垣,后来在他家住了4年。

在张城垣钻研养羊窍门的时候,吴春生结束流浪,与在安阳工作的妻子团聚,握画笔的手抓起鞭子,赶着毛驴车往工地送砖头,他还当过小工,开过搅拌机。老伴杨桃节记得,先前饭量不大的丈夫那阵一顿能吃七八两捞面条。

等来了春天

张城垣又担负起难友们“领导人”的职责,开始上访申诉。“我有一种责任感。”老人坚定地说。1980年,他们终于盼来了中央下发的《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即事关数千人荣辱的(1980)74号文件。

一些被俘回国人员得知消息,激动地失声痛哭。次年,张城垣顺利平反,他已经54岁了。

吴春生也等来了自己的春天,1980年他参加“河南省社会闲散科技人员考核”被录取,结束18年的黑户身份。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提拔为安阳自行车厂宣教科副科长。相关文件落实到他已是1985年。

老战友们正在加速离去,张城垣所在的山西运城地区,150多名归来人员如今只剩下10多个。安度晚年的张城垣也在努力忘却坎坷的际遇。

在他简朴的家中,一个硕大的柜子里,塞满与战俘营相关的书刊资料。老伴略带埋怨地说:“成天就是忙写书。”其实,张城垣的乐趣还有:如何将几千元离休金“公平”地分给从上幼儿园到读大学的子孙孙女们。

摘自《中国青年报》

葬身异国的中共要人

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故乡。在中共历史上,曾有一批党内高层人士,因为各种原因,死后只能安葬在异国他乡。

林彪:女婿要将其遗体运回国

在蒙古国漠北草原,有一块刻着“九一三遇难者之墓——2008年9月13日缅怀者敬立”的青色石碑,这就是林彪以及另外8名遇难者的孤坟。

据当年曾勘察过失事现场的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回忆,当时,中国政府决定将死难者遗体运回中国正式埋葬,或就地火化,带回骨灰。但不知何故,林彪等9人的遗骸,仍然在蒙古下葬。由于蒙古没有火化的习惯,裸尸三天的林彪一行人最终被选择土葬。按照当地的习俗,墓地就选在了失事点西北方向的高地上。

2011年9月13日,林彪女婿张云林前往林彪坠机地点祭拜。谈起这次赴蒙祭拜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林家收到消息,林彪的墓地有可能被开矿挖掘,遗骨有可能被移动。为此,张云林此行还特地会见了这片草场的私人领主。

此后不久,张云林公开表示:“明年夏天,我要把遗骨接回家,9具都接回来。”这句话引起了海内外极大关注,但此行组织者黄春光(黄永胜长子)觉得一切没那么简单,“就算林家只要林家人的遗骨,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是被割掉了(被前苏联拿走),比较容易认出来,但这两具无头遗骨也分不清哪个是叶群、哪个是林彪了。林立果的遗体也不能不管,而且也不知道蒙古的政

策怎么样。”

张国焘:与洋人共用一块碑

遗骨安葬他乡的,还有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张国焘。1938年,张国焘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之后他辗转于台湾与香港之间。1968年底,张国焘带着妻小来到加拿大。

1976年,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由此转进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他在一个寒夜中去世,享年82岁。张国焘葬地在多伦多松山墓园内。由于穷困,张国焘夫妇不得不与他人共用一块墓碑,而这块墓碑,还是由蒋经国托人汇款置办的。墓碑的背面还刻有当地一对洋人夫妇的碑文。

据墓园公司的人说,当年张国焘入葬时,登记的名字并不是他本名,而是张恺荫。这大概是刻意安排以躲避人们寻墓。

王明:与果戈理在一个墓园

与林彪、张国焘不同的是,王明虽也是被葬在异国他乡,但却跻身名人墓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曾多次要求赴苏联养病。他最后一次抵达莫斯科是1956年。从此,王明长期留在那里,直到1974年3月27日,他写完《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病逝。王明去世后,苏联政府把他安葬在著名的“新圣母公墓”,果戈理、屠格涅夫、赫鲁晓夫等名人都归宿于此。

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中,几乎每一个墓碑都是一个雕塑艺术品。在这些形态各异的雕塑中,王明墓只是一般的半身雕像,墓碑上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每逢清明时节,王明的次子王丹丁总是孤身一人,来到新圣母公墓,默默地凭吊他的父亲。

摘自《读天下》

袁世凯向妻弟借钱被讥讽

袁世凯在科举之路屡受挫折之后,想到了捐官。无奈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只好四处借钱,第一个借钱对象便是他的妻弟。岂料,妻弟非但不借,反而讥讽他说:“我看你去北京也是白跑一

趟,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后来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妻弟跑到天津,希望袁世凯能给他谋个一官半职,袁世凯断然回绝说:“外边无事可做,还是在家里待着好些。”

摘自《人民政协报》

有关钟馗的神话和故事历代不衰,钟馗的身世也被演绎得丰富多彩,那么传说中的钟馗到底是谁?

鬼王钟馗的身世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驱鬼逐邪之神。传说他系唐初终南山人,生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髯,相貌奇丑;但很有才华,满腹的经纶,且为人刚直,不惧邪祟。

钟馗的来历版本,有一说是来自明朝人所引的《唐逸史》,说的是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有一次从骊山回宫,身体不适,太医治疗了一个多月也不见效。一天晚上,唐玄宗病中梦见一小鬼盗走玉笛以及杨贵妃的绣香囊,大怒,忽见一大鬼奔进殿来。大鬼身穿蓝袍,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皮革裹足,袒露一臂,一伸手便抓住那个小鬼,剜出眼

珠后一口吞了下去。玄宗骇极,问大鬼:“你是何人?”大鬼说:“我就是多次参加武举考不中的钟馗,羞见江东父老,所以触阶而死,感谢皇上用蓝袍为我殓葬,现虽在九泉之下,仍发誓要为皇上斩除妖孽。”说完,化作一片红光飞驰而去。唐玄宗醒后,病也霍然而愈。

玄宗病好后,便令画家吴道子按其梦中所见画一幅钟馗图。图成,玄宗将吴道子《钟馗捉鬼图》镂板印刷,广颁天下,让世人皆知钟馗的神威。此后,一到岁末,家家都在门上张贴此画,以驱鬼避邪。

摘自《读友报》

张国焘脱党的前前后后

1938年4月4日农历清明节前夕,国共两党都派要员与社会各界人士祭扫黄陵。张国焘带了警卫员张海和一些同志,也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加了这次活动。此时的张国焘早已动摇了信念,不想继续待在共产党内。因此,在祭陵活动期间表现得心神不宁。国民党代表蒋鼎文、谷正鼎看在眼里,就挑拨性地试探说:“蒋委员长对你很器重,想请你去西安谈谈,不知意下如何?”张国焘正苦无逃生之计,听到邀请便受宠若惊、欣然同意。祭陵完毕,他便用开边区政府的其他人员,只带着警卫员张海,跟着蒋鼎文直奔西安。

张国焘到西安的行踪一直瞒着八路军办事处,4月7日,国民党方面欲安排他去武汉,在去火车站的前几分钟,他才打电话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约他到火车站一谈。林伯渠严正驳斥了他的荒唐言论,一再劝导他不要误入歧途。张国焘却执迷不悟,径自登上了去汉口的火车。林伯渠回到办事处,就立刻把这一情况电报中共中央。4月8日,周恩来接电后非常重视,紧急向李克农交代了到汉口车站“接

张国焘的任务。李克农领命后,便带了董小鹏、丘南章、吴志坚几位干将,全副武装地赶到汉口火车站,经过几天夜以继日地守候,终于在4月11日傍晚接到了张国焘,并把他安排在了江汉路的一家小旅馆。

4月13日,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去旅馆会见张国焘,当面出示了中共中央的“劝归”电报,同时请他搬到办事处住,有事便于商量。因为心中有鬼,张国焘说去了就会被“圈”住,顽固拒绝。周恩来解释说:“你到办事处可以和大家多交谈,行动还是一样自由嘛!”张国焘一时无法狡辩,李克农趁此机会,便连拉带劝地把他推进了门口的小汽车带回了办事处。在办事处,周恩来又连续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却始终阴阳怪气,沉默不语,执意要脱离共产党。

15日,张国焘几次找借口离开办事处,并先后会见了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前总书记陈独秀等人。回来后,张国焘坚持向周恩来提出要到武昌向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为了彻底戳穿张国焘的脱党阴谋,中共长江局领导研究决

定,由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16日上午,张国焘一见蒋介石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立即插话反驳:“你糊涂,我可不能糊涂。”接着张国焘语无伦次地讲了一些边区政府的事情。当着周恩来的面,蒋、张二人不好多说。蒋介石只好摆出“国家元首”的架子,对张勉励几句就算接见完了。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张国焘,指责他在蒋介石面前摇尾乞怜,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对此,张国焘却只当作耳边风,依然无动于衷。值此,周恩来等几位领导经过研究,并与延安电报联系,认为张国焘已决心叛党,无可救药,遂做出决定,与张国焘最后摊牌。17日上午,王明、周恩来、博古跟张国焘进行了最后谈判。周恩来等人刚一离开,张国焘就打电话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联络,表示决心投靠国民党,并在当晚就乘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武装汽车溜走了。离开饭店前,张在房间的桌子上留下一张给周恩来的字条,写道:“兄弟已决定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说明了他坚持脱离共产党的最后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乃于4月18日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摘自《从秘密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